

## 別雷小說《銀鴿》中的入會啟蒙思維\*

徐孟宜\*\*

### 摘要

俄國象徵主義作家安德烈·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 1880-1934, 本名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гаев）的文學創作，向來與他的宗教哲學思想之吸納與轉折有密不可分的關聯。20世紀初他曾經醉心俄國的教派，以為能夠藉由教派走向人民，並且以教派的集會模式做為俄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對教派感到失望之後，別雷受到史坦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的玫瑰十字會入會啟蒙說所吸引，積極投入神智學與人智學的研究，並將之視為生命的支柱。

小說《銀鴿》反映的是別雷否定教派能夠肩負拯救俄國的重擔，並在隱含的情節中表述自己對入會啟蒙的肯定。本文首先概論玫瑰十字會與神智學協會的起源、歷史與宗旨，繼而由此切入探討《銀鴿》否定黑暗東方，以及主角啟蒙失敗的過程及其意義。

**關鍵詞：**別雷、《銀鴿》、玫瑰十字會、入會啟蒙、史坦納、神智學協會

---

\* 本文 2013 年 11 月 20 日到稿，2013 年 12 月 23 日審查通過。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講師。

## The Thoughts on Initiation in A. Bely's\* *The Silver Dove*

Meng-i Schu\*\*

### Abstract

Andrey Bely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1880-1934) w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Russian symbolist writers. A. Bely's literary works were inseparably related to his absorption and transi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he was engrossed in religious sects in Russia, and regarded the gathering mode of sects as the blueprint of Russian fu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after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sects, Bely was attracted to Rudolf Steiner's (1861-1925) concept of Initiation in Rosicrucianism,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osophy and anthroposophy.

In *The Silver Dove*, A. Bely turned down the idea that religious sects could save Russia, and affirmed the Initiation in implicit plots. In this article, author firstly outlines the origin, history and object of Rosicrucianism and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n author discusses the idea of dark East in *The Silver Dove*, and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the meaning of main character's unsuccessful Initiation.

**Keywords:** A. Bely, *The Silver Dove*, Rosicrucianism, Initiation, Rudolf Steiner,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

\* Received: November 20, 2013; Accepted: December 23, 2013.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一、前言

俄國象徵主義作家安德列·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 1880-1934, 本名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гаев）的文學創作，可以粗分為幾個時期：1908 年之前以詩歌創作為主，1908 年之後小說成為他的創作核心。1923 年自柏林返回蘇聯之後，儘管別雷表示支持新政權，但他的思想與創作卻不受當局肯定，至逝世之前的寫作重心轉向回憶錄與文學研究。別雷的創作量相當可觀，與浩繁的思想歷程和生命過程交織的作品，往往被冠上「神秘的異端」（*мистическая ересь*）<sup>1</sup>而易使讀者卻步，再加上別雷傾向實驗與運用新創造的詞與寫作手法，加深了作品的複雜度。別雷作品的多面性，實際上正反映了他多面貌的自我，作家在未成年時即體悟到：沒有單一的「我」，永遠有複雜和多樣的人格或面具隱藏在單數「我」之下<sup>2</sup>。

初入文壇的別雷，沉浸於西歐哲學思想的陶冶之中（主要是康德、叔本華與尼采），除此之外，別雷也深受索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 Соловьев, 1853-1900）的宗教哲學思想所影響，生命創造（*жизнетворчество*）與永恆女性是其中兩大要素<sup>3</sup>。身為家中的獨子，別雷自幼即深刻認知自己是父母爭戰的籌碼<sup>4</sup>，上述的面具或多樣貌性格也是自童年發展而來的。1903 年別雷創立《阿爾戈英雄》（*Аргонавты*）<sup>5</sup>團體，與年齡相仿的藝文好友定期聚會，成員不以詩人自居，而是自詡為新生活風格及文化的創始人<sup>6</sup>，希望藉由創作和言行舉止「把人們的理性眼鏡從近視鼻樑打落<sup>7</sup>」。《阿爾戈英雄》的宗旨並不嚴謹明確，其間不無戲謔成分，也因此為日後的混亂埋下伏筆。別雷試圖在阿爾戈成員當中實踐心靈追尋，他結合西方

<sup>1</sup> Екатерина Кулешова, *Полифония идей и символов. Статьи о Белом, Блоке, Брюсове и Сологубе*, Торонто, 1981, с. 7.

<sup>2</sup> Taja Gut (Hrsg.), *Andrej Belyj. Symbolismus, Anthroposophie, Ein Weg; Texte-Bilder-Date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7, S. 13.

<sup>3</sup> 詳見伊琳娜·帕佩爾諾，〈藝術的意義：象徵主義理論〉，收錄於：林精華主編，《西方視野中的白銀時代》，北京，2001，頁 3-15。

<sup>4</sup> Taja Gut, 同註 2，頁 10：音樂家母親不希望別雷成為科學家，讓別雷穿女裝，暱稱他為「小貓咪」（*котик*）；身為數學教授的父親則斥責兒子 5 歲了還學不會十進位法。別雷自幼即疏遠父親，扮演母親的乖孩子。

<sup>5</sup> 《希臘羅馬神話辭典》，中和：谷風出版社，1986，頁 12-14：伊阿宋（*Ясон*）為了取回王位，率領眾英雄搭乘名為阿爾戈的大船前往柯爾客斯取金羊毛。

<sup>6</sup> Klaus Städtke, *Rus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Stuttgart, 2002, S. 246.

<sup>7</sup> 引自 Taja Gut, 同註 2，頁 17。

與索洛維約夫的哲學思想，摻雜對俄國神秘教派的嚮往，將之投射在想像中的密教崇拜儀式，但是密儀崇拜卻急速變質，別雷則須承受此混亂與狼狽<sup>8</sup>。

對於許多象徵主義派作家而言，1905 年沙皇政府對示威民眾的血腥鎮壓、各地罷工浪潮與革命失敗，讓他們的重心轉移到現實社會上。在探討俄國的危機與未來走向的問題時，許多知識份子試圖從自身的文化傳統尋求解決或改善的途徑，而許多象徵主義派作家受到一些神秘教派——尤其是鞭笞教派（скопчество）——所吸引，他們投射期望在偏離東正教的小教派之上，且將之理想化，認為知識份子能夠透過教派走向人民，教派所建立的共同生活圈能使社會階層區隔和性別差距消失，透過狂喜恍惚的集會方式則能實現超驗體會，豐富創造力<sup>9</sup>。別雷的文章〈綠草地〉（Луг зелёный, 1905）正是他此時期的思想反映，但是他並未在這個理念中逗留太久，如同其他象徵主義派作家一般，他對鞭笞教派的狂熱也在數年後消退，原先論及教派的讚揚與投入態度，逐漸被疏離與諷刺所取代。

1908 年秋天，別雷在莫斯科的神智學協會（Теософ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sup>10</sup>圈子結識明茨洛娃（Анна Рудольфовна Минцлова, 1860-1910?），後者是史坦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sup>11</sup>的學生，將史坦納的講稿與著作譯成俄文，引進俄國藝文界。別雷早在青少年時期就接觸過神智學，但是他的興趣隨即轉向叔本華、康德與尼采，對神智學會一度感到排斥<sup>12</sup>。明茨洛娃自認為肩負在俄國宣揚神智學的使命，力邀別雷和伊凡諾夫（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 1866-1949）與她組成三人小組。別雷重新受到神智學吸引，研讀史坦納的講稿，他

<sup>8</sup> 別雷冀望重現伊留西斯密儀（eleusinian mystery）失敗，與尼娜·彼得羅夫娜的友情轉變為情慾關係，且倉皇逃離後者。詳見 Daniela Rippl, *Žiznetvorčestvo oder die Vor-Schrift des Textes.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lechter-Ethik und Geschlechts-Ästhetik in der russischen Moderne*, München, 1999, S. 178-179; 筆者，〈布留索夫小說《燃燒的天使》中的愛情與魔法〉，《俄語學報》Vol. 21, 2013, 頁 132-134。

<sup>9</sup> Henrieke Stahl-Schwaetzer, *Renaissance des Rosenkruzertums: Initiation in Andrej Belyjs Romanen Serebrjanyj golub' und Peterburg*, Frankfurt am Main, 2002, S. 54-57, 62.

<sup>10</sup> 神智學協會於 1875 年由布拉瓦斯基（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 1831-1891，次處沿用她在歐美通行的名字 Helena Blavatsky 的音譯）和奧爾柯特（Henry S. Olcott）創立。俄國的神智學會正式成立於 1908 年，但實際上神智學早在十九世紀八零年代就在俄國知識份子圈中流傳。詳見 Maria Carlson, “Fashionable Occultism. Spiritualism, Theosophy, Freemasonry, and Hermeticism in Fin-de-Siècle Russia”, in: 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Ed.),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London, 1997, pp. 135-154.

<sup>11</sup> 史坦納當時仍是神智學協會德國分會的秘書長，在歐洲各地舉行演講。1912 年脫離神智學會，另創人智學會（Anthroposophische Gesellschaft）。

<sup>12</sup> J. D. Elsworth, *Andrej Bely: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Nov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7.

尤其受到史坦納所提倡的玫瑰十字會（Rosenkreuzer / Розенкрейцерство）的入會啓蒙思想所吸引，認為這是解除當時俄國文化危機的途徑。然而此時的明茨洛娃已脫離史坦納的教導，自行發展，她給與別雷的冥想指導並未讓他受益。1910年春，別雷決定疏遠明茨洛娃本人，但是對神智學的興趣卻不減分毫。<sup>13</sup>

不論是研究康德、尼采的哲學、《阿爾戈英雄》團體的模仿密教崇拜，或是俄國的鞭笞教派、神智學與人智學中神祕學教導，別雷除了在其中尋求渴望的手足情誼，以及實現成爲秘密團體一員的嚮往之外<sup>14</sup>，教派或神祕學團體的入會啓蒙儀式與過程始終相當吸引他，並且視個人的心靈進展爲俄國社會進展的縮影。

別雷在1909年初開始寫作小說《銀鴿》（Серебряный голубь），雖然他直到1912年才在一場演講會上見到史坦納本人，並開始積極投入人智學的研究與活動<sup>15</sup>，但是透過明茨洛娃的引介，史坦納所講述的玫瑰十字會啓蒙次第對別雷而言已不陌生。小說《銀鴿》展現東西方思想的衝突，別雷以俄國教派做爲描摹「東方」的範本，而理性的「西方」則蘊含玫瑰十字會的入會啓蒙思維<sup>16</sup>。

本文試圖由吸引別雷的玫瑰十字會啓蒙思維著手，概述其內涵與意義，並以此切入分析《銀鴿》，期望藉由觀照此啓蒙思維，進一步理解別雷的創作理念。

## 二、玫瑰十字會與史坦納的啓蒙思維

俄國象徵主義派作家一向對神祕學與祕密結社有高度的興趣，而各種神祕學團體，不論其宗教或政治成分的多寡，在數世紀之前的確是「秘密」社團，入會須經篩選，已入門之學徒或教徒則須對其學習和體驗守密。密教團體通常有入會啓蒙（initiation / инициация）之

<sup>13</sup> Taja Gut, 同註 2, 頁 17: 別雷脫離明茨洛娃的三人組之後，明茨洛娃宣告傳播神智學的使命失敗，隨即神祕失蹤。

<sup>14</sup> 別雷在〈回憶布洛克〉之中提到：《阿爾戈英雄》的成員讓他有兄弟情誼與身處兄弟會之感。此處引自 Г. В. Нефедьев, "Русский символизм и розенкрейцерство", в: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004, 2002, с. 157.

<sup>15</sup> Taja Gut, 同註 2, 頁 18。

<sup>16</sup> 由於別雷是在1913年決定追隨史坦納，並認定人智學是他日後的重心，研究者對於別雷1912年以前的作品是否受到人智學影響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詳見 Henrieke Stahl-Schwaetzer, 同註 9, 頁 15。

儀式，儀式中入門者往往須經歷象徵性的死亡與重生，脫離入會／入教前無知與無明的狀態。入會之後則有循序漸進的學習，其教導多半與擴張人現有感知能力有關，密教團體認為，擴大的知覺與超感知體驗能達到與神連結，或者與萬物合一的狀態。而象徵主義派作家視此狀態為創作力的絕佳來源，甚至是人生追尋的目標，因此投入相當大的時間精力研究神秘學、加入或自創各種與神秘學相關的團體。

別雷的哲學、宗教與神秘學追尋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1912 年之前這些理念呈現一種游移不定、甚至互相矛盾的現象，直到 1912 年之後才發展出較固定的世界觀，史坦納和心智學從此成為他生命的支柱。而 1908 至 1912 年之間，則是轉變與趨近的時期。史坦納在此時期宣揚的玫瑰十字會啓蒙之路，對別雷的影響尤其深遠。在檢視史坦納的理念之前，有必要先精簡地概述玫瑰十字會本身與其影響。

## 1. 玫瑰十字會的起源與影響

玫瑰十字會是西方神秘學歷史上最具有爭議性的研究範疇之一，儘管自 17 世紀以來相關的研究與討論不斷，但是它的存在與否至今無人能夠論斷。因此，吸收玫瑰十字會理念而衍生的秘密結社與流派，比起其它的密教團體來得多許多，某些團體宣稱本身是玫瑰十字會的嫡傳組織；而某些團體雖然名稱與玫瑰或十字無關聯，但深究其架構或理念時，則能發現與玫瑰十字會的隱含關聯<sup>17</sup>。

玫瑰十字會一詞最早出現在 1614 至 1616 年德國卡賽爾（Kassel）市出版的三分匿名發表<sup>18</sup>文件當中：《兄弟會的名譽》（*Fama Fraternitatis*, 1614）、《兄弟會的告白》（*Confessio Fraternitatis*, 1615）、《克里思青·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以下簡稱《化學婚禮》）（*Chymische*

<sup>17</sup> 名稱相近者最著名的是 1756 年創立的《金玫瑰十字會》（*Orden der Gold-und Rosenkreuzer*）；有內在關聯的則以神智學協會和 1888 年創立的《黃金黎明》（*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較為人所知。詳見：<http://de.wikipedia.org/wiki/Rosenkreuzer>

<sup>18</sup> 三份文件的作者如同玫瑰十字會本身無法定論，但一般研究傾向將之歸於安德列亞（*Johann Valentin Andreae*, 1586-1654），三份文件出版之時，他仍是神學院的學生。安德列亞只在私底下承認《化學婚禮》是他的著作，且在日後與玫瑰十字會的相關議題保持距離。詳見 *Harald Lamprecht, Neue Rosenkreuzer. Ein Handbuch*, Göttingen, 2004, S. 40; 海野弘著，黃靜儀譯，《秘密結社的世界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 93-94。

Hochzeit Christiani Rosencreutz, 1616), 其中《兄弟會的名譽》除了批評當時的宗教與知識界目光短淺, 無法摒棄成見相互合作之外, 還敘述修士 C. R. C. (在前兩份文件中僅以縮寫表之) 的傳奇生平、創立玫瑰十字會、以及發現其墓室與手稿的過程, 此篇文章一般被視為玫瑰十字會的宣言。<sup>19</sup>由於《兄弟會的名譽》一文中提出: 透過玫瑰十字會結合靈性與科學的教育方式, 才能達到真正的知識改革<sup>20</sup>, 此秘密團體與理念引起廣大迴響與討論。第二份文件《兄弟會的告白》重點在於為第一份文件辯護, 並且更深入闡述玫瑰十字會的理念。第三份文件《化學婚禮》的風格迥異於前二者, 以修士羅森克魯茲為第一人稱, 自述獲邀參加國王婚禮的七日經歷, 通篇充滿隱晦的譬喻與象徵, 但也正因為幽微難解, 反而是三份文件當中引發最多論述、詮釋與挪用的一篇<sup>21</sup>。

《兄弟會的名譽》、《兄弟會的告白》, 以及《化學婚禮》內文涉及的層面甚廣, 其中包含了鍊金術、赫密斯主義、新柏拉圖思想、卡巴拉研究...等等。雖然玫瑰十字會極可能只是虛構的密教團體, 但是它儼然提供了一個祕密結社的理想典範, 當時及後世之人, 除了研究辯論這三篇文章之外, 尋求各種可能管道想加入玫瑰十字會者所在多有, 同時也有許多宗教與知識界的知名人物被懷疑是玫瑰十字會的成員<sup>22</sup>, 玫瑰十字會對於十七世紀以降的許多祕密結社和神秘學團體的組成和演變, 可謂扮演了關鍵性的要角。

## 2. 史坦納與其玫瑰十字會啟蒙理念

1875年由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 1831-1891)所成立的神智學協會(Theosophical Society / Теософ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其宗旨在於建立一個不分出身、信仰、性別或種族的普世的兄弟會, 平等看待並探究所有的宗教、哲學和自然科學, 研究無法解釋的自然法則與隱藏人體內的力量<sup>23</sup>。神智學協會是一個融合東西方宗教與神秘學教導的團體, 因為其兼容並蓄

<sup>19</sup> Harald Lamprecht, 同註 18, 頁 19-26。中文「羅森克魯茲」即是玫瑰十字的音譯。

<sup>20</sup> Harald Lamprecht, 同註 18, 頁 23。

<sup>21</sup> Harald Lamprecht, 同註 18, 頁 30-32。

<sup>22</sup> 例如義大利哲學與天文學家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英女皇伊麗莎白一世的顧問迪伊(John Dee, 1527-1608)、德國天文學家及數學家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等等...。詳見 <http://de.wikipedia.org/wiki/Rosenkreuzer>

<sup>23</sup> Harald Lamprecht, 同註 18, 頁 167-168。

的創會精神，成立之後迅速在歐美擴展。神智學協會之於 19 世紀末、乃至 20 世紀以降的許多神秘學團體和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的程度，比起玫瑰十字會之於 17 世紀之後的影響，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玫瑰十字會所代表的歐洲神秘學傳統，被神智學協會所吸納，創立者與後繼者加入個人對「東方」——主要是佛教和印度教——密教傳統的理解，使得神智學協會的神秘學體系更為龐雜。

1902 年神智學協會德國分會選出史坦納擔任秘書長。相較於強調一切宗教平等的神智學協會理念，史坦納本人則認為基督教較優於其他宗教，也較適合歐洲人<sup>24</sup>，此時期他在歐洲各地的演講，雖然都以「神智學」一詞指稱自己的世界觀與理念，但實際的內容與神智學協會所教導的已大不相同。1912 年史坦納終於與關係緊張的神智學協會分道揚鑣<sup>25</sup>，另創人智學協會（Anthroposophische Gesellschaft / антропософ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史坦納在二十世紀初的許多演講中不斷提及玫瑰十字會、引述《化學婚禮》的章節，他並非想要複製或重現此兄弟會，也對史實研究之部份不感興趣。他將克里斯青·羅森克魯茲（Christian Rosenkreuz）看做一位追尋靈性的人，而他的追尋道路則可做為現代人的典範。<sup>26</sup>他認為人智學首先是一種覺知的道路：人需要覺察到更高的靈性世界是存在的，而這份覺察能使自我與周遭更和諧，所得的智慧不是僅存於腦或心，而視需要將之應用在服務人群的事業之上，透過入會啓蒙的學習，人從改變自身做起，進而可以改變社會，改造世界。<sup>27</sup>人智學的靈性覺知並非來自被動接納某一上師或導師的學說，而是強調學習者及成員須有自己個人的體悟。玫瑰十字會的啓蒙道路是他認為最適當的，因為此種方式給學生最大的自由，對於當時的歐洲人而言最能從中獲益<sup>28</sup>。

<sup>24</sup> Renate von Maydell, "Anthroposophy in Russia", in: 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Ed.),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London, 1997, p. 153.

<sup>25</sup> 神智學協會在創會不久之後，總會即從紐約遷至印度。1907 年貝贊特（Annie Besant, 1847-1933）接掌神智學協會，貝贊特深受印度教吸引，將協會在南印度發現的男孩視為佛陀或基督的轉世（即日後的克里希那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1895-1986），極力栽培他。此舉引起史坦納強烈反對，導致德國分會與神智學協會決裂。詳見 Harald Lamprecht, 同註 18，頁 168、192；Gerhard Wehr, *Anthroposophie*, Kreuzlingen / München, 2004, S. 13; Pupul Jayakar 著，胡因夢譯，克里希那穆提傳，台北：方智出版，1994，第一章。

<sup>26</sup> Gerhard Wehr, 同註 25，頁 17。

<sup>27</sup> Gerhard Wehr, 同註 25，頁 18-19。

<sup>28</sup> 魯道夫·史丹勒原著，潘定凱編譯，《靈性科學入門》，台北：琉璃光出版，2008，頁 168-169。



俄國神智學協會內部也有理念不同的派系之分，象徵主義派作家則因前文所提及的明茨洛娃之故，較親近神智學協會德國分會的教導。<sup>29</sup>

### 三、《銀鴿》中「東方」之惡與錯誤的啟蒙途徑

如前文所述，別雷在 1909 年 2 月開始寫作小說《銀鴿》之時，已經從對俄國教派的狂熱之中脫離出來，並計畫將這個受教派吸引、著迷，而後疏遠否定的過程納入創作的內容之中。別雷曾將自己的小說《彼得堡》贈送給瑪莉·史坦納·馮·西芙絲（Marie Steiner- von Siviers, 1867-1948，史坦納之妻），並且在 1913 年秋天的信上提及自己「東方—西方」小說創作的三部曲計畫：「第一部分《銀鴿》，是對黑暗的東方說「不」；第二部分《彼得堡》，是對崩裂的西方說「不」；第三部分《看不見的城市》，才會出現一個肯定...」<sup>30</sup>對於東西方的內涵，別雷也曾進一步補充：「.....《銀鴿》——這是沒有西方的東方；因此，這裡出現了惡魔（長有鷹喙的鴿子）。《彼得堡》——這是在俄國的西方，亦即阿里曼<sup>31</sup>的幻想，在那裡，技術主義——即邏輯的赤裸裸的抽象，創造出了罪惡之神的世界。《我的一生》則是西方的東方或東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動因在靈魂中的誕生。」<sup>32</sup>雖然三部曲的第三本《我的一生》始終沒有完成，前兩部小說的人物也不一致，但是內在關聯仍舊存在。

在上述引言之中，別雷將被否定的東方標誌為「惡魔」，而小說《銀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受魔所困」的歷程與感受。他曾經敘述如下：「小說反映我在這段期間掙扎受折磨的個人感覺：一種被跟蹤的病態感、一種被網住和即將毀滅的感覺；所有這些錨定在《銀鴿》的情節之中。我將我的『疾病』外顯於小說情節的同時，我也從中獲得解脫。」<sup>33</sup>由此同時也可看出：別雷把寫作看做一種身體的過程，書寫的行爲則成了自我療癒和自我救贖的方式。別雷自早年就有被害妄想症，此傾向自 1904 年變得更加嚴重，以至於曾將布留索夫

<sup>29</sup> Renate von Maydell。同註 24，頁 157。

<sup>30</sup> Taja Gut，同註 2，頁 56。

<sup>31</sup> 阿里曼（Ahrimon）是古波斯宗教中的惡神，被視為罪惡與黑暗的根源。

<sup>32</sup> 摘自劉文飛。〈譯序〉。安·別雷著。李政文、吳曉都、劉文飛譯。《銀鴿》，台北：商鼎，1999，頁 8。

<sup>33</sup> 原文出自 'Между двух революций' (1934)，此處引自 Daniela Rippl，同註 8，頁 116。

看做邪惡勢力的人形化身，而自己則是不得不與此有形及無形的惡魔勢力爭戰<sup>34</sup>。然而別雷的創作動機與過程，並非僅止於書寫自傳體小說，小說中的主角達爾雅爾斯基(Дарьяльский)所代表的，更是當時俄國許多知識份子的境遇。

## 1. 東方之惡

小說《銀鴿》的情節並不複雜：主角知識青年達爾雅爾斯基(Дарьяльский)在鄉間閒散度日，結識貴族少女卡嘉(Катя)，兩人相戀，旋即訂婚。達爾雅爾斯基卻立刻受到農女馬特廖娜(Матрена)的魅惑，加入後者所屬的神秘教派「鴿派」。鴿派領導人庫捷雅羅夫(Кудяров)冀望雅爾達爾斯基和馬特廖娜結合，為教派產下聖靈之嬰。計劃失敗後，達爾雅爾斯基欲重回未婚妻卡嘉的懷抱，卻被鴿派教徒視為叛徒，予以殺害。小說的時間由六月聖靈降臨節的前夕至九月；空間架構分布於俄國三個村鎮，卻在作者跳接式的敘述與詩意描寫、心靈獨白中，產生一種不明確感。

小說《銀鴿》以神秘的小教派「鴿派」為東方惡的代表與中心，利霍夫城(город Лихов，俄文 *лихой* 意指邪惡不祥的)有鴿派信徒秘密集會的據點：商人葉羅別金(Еропегин)的家，眾人趁著葉羅別金外出時在此聚會，將它變成一個鴿子窩(56)<sup>35</sup>，鴿派的主導人銅匠蘇霍魯科夫(Сухоруков)也住在城中；另一個東方勢力的據點是采列別耶沃村(село Целебелево)，鴿派領導人庫捷雅羅夫(Митрий Кудяров)與情婦馬特廖娜(Матрена)住在山坡上的小屋裡；而游走兩地之間的鴿派信徒乞丐阿勃拉姆(Абрам)，更將兩地的惡魔勢力緊密連結。

36

別雷對於惡魔東方的描繪與刻劃，挪用許多俄國民間對魔鬼的傳統表徵，例如木匠庫捷雅羅夫的長相畸形，那不是一張臉，——而是一根瘦骨嶙峋的羊骨頭(50)；進行祈禱儀式時的木匠則往往令人聯想到織網的蜘蛛(254)；葉羅別金家的女僕安奴什卡(Аннушка)也是

<sup>34</sup> Henrieke Stahl-Schwaetzer，同註 9，頁 117。

<sup>35</sup> 安·別雷著，李政文、吳曉都、劉文飛譯，《銀鴿》，同註 32，頁 56。以下引用時僅標出頁數。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Избранная проза*, Москва, 1988.

<sup>36</sup> 關於木匠庫捷雅羅夫和情婦瑪特廖娜的形象分析請詳見筆者，〈別雷小說《銀鴿》中的東西文化衝突〉，《俄語學報》，Vol.6，2003，頁 205-209，此處不再贅述。

鴿派信徒，穿著白袍時就像一隻貧血的蝙蝠（62）；；原本代表和平與純潔的白鴿，在鴿派信仰中也轉變為鉛灰色，甚至變成具有致命攻擊力的鷹頭鴿，啄開了達爾雅爾斯基的胸膛（288）；利霍夫城則處處充滿了泥濘與灰塵：

〔...〕於是，這座受上帝保佑的小城中的居民，就是說，便生活在兩種深淵之間，在深淵似的泥濘和深淵似的灰塵之間；〔...〕（將受上帝保佑的這一說法用於利霍夫，更像是一種妝點門面的浮誇方式；坦白地說，利霍夫城是一座不受上帝保佑的城，就是說，它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得到過任何人任何形式的保佑：恰恰相反，這是一個被胃病、火災、酗酒、放蕩和無聊所毀壞的城市。）（58-59）

泥濘、灰塵、深淵和城中四處亂跑的豬（61），皆指出利霍夫城是個邪惡的魔鬼之地<sup>37</sup>。從另一角度來看，所謂邪惡的東方之地，事實上展現的是被西方基督教文化邊緣化與妖魔化了的古代異教信仰特徵：對大地孕育力的崇拜，泥土與土地被視為黑暗不潔，瑪特廖娜的父名西蒙諾夫娜（Семёновна）暗指她如種子（семя）一般的生育繁殖力，但她的形象遠非受崇敬的女神，而是鷓鷹、老虎（8）、吸血鬼、母獸和女妖（284）。庫捷雅羅夫堅信鴿派的信仰將會帶領信眾走向更好的境地，但與此同時他卻又以服侍主為名，唆使馬特廖娜誘惑達爾雅爾斯基，並在計劃失敗後犯下罪行，殺了後者。

## 2. 東方式的錯誤啟蒙途徑

小說中鴿派的惡魔勢力是主動出擊且力量強大的，它透過欲念吸引與控制人。鴿派信眾的作為是惡的表徵，儀式集會在當下會令人產生恍惚的快感，但升天的錯覺很短暫，清醒之後更覺迷惘：

澡堂裡一片安靜〔...〕那位禱告者（木匠）時而倒下，時而起立，伸著他那雙瘋狂的手，為了兄弟們，為了俄羅斯，為了讓俄羅斯那秘密的歡樂能夠實

<sup>37</sup> 豬在西方基督教傳統或是俄國民間故事中，皆是惡魔的象徵，詳見 Kristi A. Groberg, “The Shade of Lucifer’s Dark Wing: Satanism in Silver Age Russia”, in: 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Ed.),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London, 1997, p. 125.

現，為了讓靈魂能成功地化身為人的肉體，讓世界成為木匠他所希望的那樣；他呻吟著，叫喊著，祈求著〔...〕老太太們也已走進了澡堂；這些小老太婆們像死神一樣，醜陋不堪，駝背佝腰，臉上疙里疙瘩的〔...〕木匠使勁地讓他們看兩邊；於是，他們已經既看不到天花板也看不到牆壁了〔...〕一個小時前，這還是一些醜陋的、骯髒的、卑賤的臉，可此刻，這些臉龐卻在不斷地湧出明亮的涼爽，就像落雪，就像太陽；而眼睛——眼睛低垂著；空氣呢，——不是空氣，而是彩虹；禱告也不是禱告，——而是空中彩虹的變幻。〔...〕早晨，天空，空氣，露珠，一切都是藍色的：葉羅別金家的大門吱啞了幾聲；一些臉色發綠、神情陰鬱的人走出大門，無聲無息地、沒有生氣地各自回家了。(67-73)

若從史坦納所倡導的玫瑰十字會啓蒙來看，鴿派信眾夜半集會是一種錯誤及失敗啓蒙的途徑：入會者藉由降低意識力進入出神狂喜的狀態，似乎短暫瞥見較高世界的榮光，但回到常態世界後不僅未能保有神秘體驗的啓發，反而落入體力與情緒更加低落的狀態。別雷認同史坦納所主張的啓蒙態度：在做功課時絕對不能失去全然覺知的自我控制力。每日生活更是要能對每一細節皆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思考判斷，若掉在幻境中就完了。要時時刻刻維持智識的清明、念頭的清醒<sup>38</sup>，玫瑰十字會式的啓蒙練習是以意識清明、思慮清晰為前提，而不是藉由狂舞、顫動或致幻劑快速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

木匠庫捷雅羅夫本人雖然能獲得神秘的超驗體驗，但是缺乏高等靈界的知識，因此在面對信眾或達爾雅爾斯基時，他只能操作，而不能教導，跟隨者身分等同於入會的學生，卻無法經由有系統的、知識性的教導學習而獲得啓蒙。尤有甚者，教派使達爾雅爾斯基的意識變弱，且對他另有所圖，他尋求啓蒙的意圖註定無法如願。別雷透過達爾雅爾斯基的命運指出，與教派結合並不能更新生活，反而露出它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色彩。

---

<sup>38</sup> 魯道夫·史丹勒原著，潘定凱編譯，《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門》，台北：琉璃光，2008，頁 68。

#### 四、達爾雅爾斯基的失敗啟蒙與其意義

從小說《銀鴿》第一章之中對達爾雅爾斯基的描述可以看出，主角長久以來追尋神秘的啟蒙經驗，他首先否定傳統的宗教，研讀西方哲學、古典文學，也期盼在神秘學的領域遇見他引頸期盼的晨曦：

他沉浸在一本本大部頭的著作中，〔...〕研讀著伯麥、愛克哈特和史威登堡，尋求著其霞光的秘密，可在任何地方他都沒有找到這一秘密，沒有找到；如今他已孤身一人，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了；如今他成了一個朝聖者，獨自走在田野上，懷著他那些奇異的、難以統一的思想，但是，他卻一直滿懷著霞光，滿懷著霞光那鮮紅的漫溢，滿懷著霞光那熾熱的、貪婪的親吻；霞光對他顯示出秘密與他的某種親近、向他的某種逼近〔...〕（33）

達爾雅爾斯基的學識養成說明了他對西方文哲與神秘學的熟稔與喜好：伯麥（Jakob Böhme, 1575-1624）與愛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8）皆是德國神秘學與哲學家，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則是瑞典的科學與神秘學家。此處別雷援用索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晨曦霞光崇拜，後者以常以晨曦代表永恆的女性索菲亞，但晨曦崇拜並非索洛維約夫獨創，最早的源頭可追溯到伯麥的著作之中<sup>39</sup>。達爾雅爾斯基原本以為代表西方的卡嘉就是他的晨曦，但是馬特廖娜誘惑他，也使晨曦霞光的義涵變質，轉為火光與災難。

##### 1. 達爾雅爾斯基的啟蒙經歷

別雷在寫作《銀鴿》的同一年，曾在《天平》（Весы）雜誌發表一篇紀念果戈理誕辰 100 週年的文章〈果戈理〉（Гоголь, 1909），文中他將果戈理的生命經歷視為啟蒙的過程：入會後須先經歷恐懼、著迷與愛這三個階段，然後才會開始真正的啟蒙<sup>40</sup>。而《銀鴿》主角與鴿

<sup>39</sup> Henrieke Stahl-Schwaetzer，同註 9，頁 99。

<sup>40</sup> 此處引自 Henrieke Stahl-Schwaetzer，同註 9，頁 105。

派的接觸過程，也是始於恐懼，過程中曾出現著迷的階段，但是達爾雅爾斯基並沒有完全克服恐懼，最後在教派和瑪特廖娜身上並未找到愛，而是回復到懷疑和恐懼的階段，最後達爾雅爾斯基選擇與教派分道揚鑣，卻無法逃過他們的毒手。入會啓蒙在小說中並未成為明顯的情節，但隱含在主角的夢境、心情和經歷之中。

如同前文所引述的，鴿派信仰的實踐模式是降低意識感知，而非保持頭腦的清醒，擴張意識，達爾雅爾斯基與他們接觸之後，經常進入神智不清明的狀態：

達爾雅爾斯基顫抖了一下。

他離開了教堂，他不記得，他的雙腳怎樣將他帶到了池塘邊一塊突出的裸石上；池水那冰冷的水花使他暈眩：他昏睡了，彷彿在水聲中聽見了保姆的搖籃曲，在這裡，在白晝之中，一切都奇異、混濁地回到了他的身邊；他在用目光搜尋一個村民，可沒有一個村民打這裡走過；風吹了起來，搖晃著灌木叢；思想也在這樣搖晃著他——他已經昏睡了。(34)

「昏睡」是宗教與神秘學中對於閉塞無明的譬喻，顯示達爾雅爾斯基是遠離而不是靠近啓蒙的道途。在他對教派的沉迷漸退之時，曾隱約感覺有人恰在那個悲慘時分向他的靈魂發起攻擊(129)，然而會在夢境出現的直覺預見，卻同樣因為他的「不記得」而無任何警惕作用：達爾雅爾斯基思緒沉重地甦醒過來，拼命細細地回想他夢見了什麼：他什麼也沒記住(129)。

教派的確對他進行惡的攻擊，在啓蒙的進程中扮演阻力的角色，但達爾雅爾斯基也曾主動背棄西方，選擇往東方深淵行去。達爾雅爾斯基的友人施米特<sup>41</sup>是西方神秘學教導的化身，他(達爾雅爾斯基)回憶起去年，當施米特指示他的命運時，開闢了他秘密知識的光輝道路；他差一點跟他出國——去他們，他兄弟們那裏，他在遠處影響他的命運(191)。但是施米特代表的是只擁有神秘學知識，而無實際操作與體驗的西方，與木匠恰成對比，因此施米特解讀達爾雅爾斯基的星盤，提醒他近期需小心在意時，達爾雅爾斯基否定了施米特的警告，並對他說：我不相信命運：在我的生命中生命的創造會戰勝一切……(191)。

雖然達爾雅爾斯基察覺鴿派信徒將會加害他，但仍舊因為自己未保持意識的清明與警覺，

<sup>41</sup> 施米特(Шмидт / Schmidt)在小說中僅以姓氏出現，明顯點出他與俄國傳統無關，且極可能源自德國。

疏忽大意地落入陷阱之中，連隨身攜帶的抗惡武器——手槍與長杖都粗心地遺落在觸手不及之處，達爾雅爾斯基被擊斃，屍體則被埋在葉羅別金家後院的果園裡。

史坦納本人雖然推崇玫瑰十字會的入會啓蒙方式，但他也曾闡述其他兩種啓蒙的道途，一是東方的瑜珈式，二是基督式，三是玫瑰十字會式<sup>42</sup>，他認為在歐洲人中，基督式的教法最適合那些情感強烈的人，至於那些有點脫離了教堂，相信科學，被科學訓練成有懷疑心的人，則最適合玫瑰十字派修法<sup>43</sup>。別雷將啓蒙的次第暗嵌入達爾雅爾斯基的命運時，也並未拘泥於一門一派的漸次。若以基督式的修法檢視達爾雅爾斯基的啓蒙次第，各階段啓蒙的外在徵兆都會或隱或顯地出現，但內在徵兆則皆證明啓蒙的失敗，簡述如下：第一層次是「洗足」<sup>44</sup>，達爾雅爾斯基在此並未被洗足，反而見到馬特廖娜把雙腳伸入池塘的水中（36），他沒有感受到洗足所生起的謙卑心，反而受到馬特廖娜眼神的蠱惑。第二層是「鞭打」，再次同樣沒有發生真正的鞭刑，而是以達爾雅爾斯基挨了卡嘉祖母一個耳光替代（139），他並沒有產生勇敢面對之心，反而因此遠離卡嘉。第三層是「棘冠」，接續鞭刑的恥辱，戴上棘冠表示忍受痛苦，仍堅持自己的信仰。達爾雅爾斯基雖然為自己編了荆冠，但他的模樣野性、高傲，連他自己也感到陌生（164）。戴了棘冠的達爾雅爾斯基成了異教信仰中長角的神/魔，縮在橡樹洞裡等待馬特廖娜。第四層是「被釘於十字架上」，須能體會不過度重視肉身。達爾雅爾斯基在木匠施法而產生的幻覺中，看見自己被鷹頭鴿啄開了胸膛，陶然喜樂，但清醒時發現這似乎是醉酒之後的妄念（288-290）。第五層是「神祕的死亡」，須能感受人世間的空無感。達爾雅爾斯基在此階段經受的不是象徵性的死，而是真正的死亡。第六層是「埋葬」，在此須感受到與萬物不再分離、與地球合而為一。達爾雅爾斯基的肉體被埋葬，是肉體的合一，而非精神的體驗。第七層是「復活」，史坦納認為此層級無法以語言描述，達爾雅爾斯基本人不可能復活，但做為一個概念而言，他被埋入豐沃的果園，也暗指將如同種子一般在未來發芽新生。

<sup>42</sup> 魯道夫·史丹勒原著，潘定凱編譯，《靈性科學入門》，同註 28，頁 167-169。史坦納的基督式指的並非傳統的基督教修會，而是帶有靈知思想的諾斯替教派。

<sup>43</sup> 魯道夫·史丹勒原著，同註 42，頁 169。

<sup>44</sup> 基督式修法詳見魯道夫·史丹勒原著，同註 42，頁 186-191。

## 2. 啟蒙失敗的意義

《銀鴿》在情節的隱含層面敘述了達爾雅爾斯基的啟蒙失敗，別雷的用意並不是以此證明，面對東方黑暗勢力是完全無出路無勝算的，相反地，他以反烏托邦的敘事<sup>45</sup>方式間接肯定入會啟蒙的價值，並認為適當的入會啟蒙道途能改變與改善自身，從而將影響力擴及社會與國家。《銀鴿》除了表述俄國知識份子對教派的肯定、著迷、期望破滅、冷淡疏遠的過程之外，並隱含另一種別雷認為可拯救俄國於危機之中的可行方式，那就是遵循入會啟蒙的漸次，以個人靈性與意識上的提升作為俄國未來發展的指標。

## 五、結語

別雷以小說《銀鴿》闡述自己與俄國知識份子在 20 世紀初的追尋與探索，否定代表黑暗東方的俄國教派，認為與教派結合是一條不切實際的道路，並不能真正對俄國的發展有所助益。否定東方的情節線底下隱含別雷認為可行的改革方式，即是採行史坦納所提倡的玫瑰十字會入會啟蒙修行，儘管小說主角達爾雅爾斯基的死表示，這個抉擇無法立即見到成果與功效。

小說《銀鴿》的宗教哲學底蘊龐雜，本文僅能初步爬梳最淺表的層面，其他更深入的主題則期盼日後能再探究。

---

<sup>45</sup> Henrieke Stahl-Schwaetzer, 同註 9, 頁 237。



## 參考書目

### 期刊論文

Г. В. Нефедьев, "Русский символизм и розенкрейцерство", в: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004, 2002.

徐孟宜，〈別雷小說《銀鴿》中的東西文化衝突〉，《俄語學報》，Vol. 6，2003。

徐孟宜，〈布留索夫小說《燃燒的天使》中的愛情與魔法〉，《俄語學報》Vol. 21，2013。

### 專書

Белый. Андрей. *Избранная проза*, Москва, 1988.

Кулеш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Полифония идей и символов. Статьи о Белом, Блоке, Брюсове и Сологубе*, Торонто, 1981.

Carlson. Maria. "Fashionable Occultism. Spiritualism, Theosophy, Freemasonry, and Hermeticism in Fin-de-Siècle Russia", in: Rosenthal. (Ed.) Bernice. Glatzer.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London, 1997.

Elsworth. J. D. *Andrey Bely: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Nov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Groberg. Kristi. A.. "The Shade of Lucifer's Dark Wing: Satanism in Silver Age Russia", in: Rosenthal. (Ed.) Bernice. Glatzer.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London, 1997.

Gut. Taja. *Andrej Belyj: Symbolismus, Anthroposophie, Ein Weg; Texte-Bilder-Date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7.

Maydell. Renata. von. "Anthroposophy in Russia", in: Rosenthal. (Ed.) Bernice. Glatzer.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London, 1997.

Rippl. Daniela. *Žiznetvorčestvo oder die Vor-Schrift des Textes.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lechterßEthik und Geschlechts-Ästhetik in der russischen Moderne*. München, 1999.

Städtke. Klaus. *Rus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Stuttgart, 2002

Stahl-Schwaetzer. Henrieke. *Renaissance des Rosenkreuzertums: Initiation in Andrej Belyjs Romanen Serebrjanyj golub' und Peterburg*. Frankfurt am Main, 2002.

Wehr. Gerhard. *Anthroposophie*. Kreuzlingen/München, 2004.

安·別雷著。李政文、吳曉都、劉文飛譯。《銀鴿》，台北：商鼎，1999。

魯道夫·史丹勒原著，潘定凱編譯，《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門》，台北：琉璃光，2008。

魯道夫·史丹勒原著，潘定凱編譯，《靈性科學入門》，台北：琉璃光出版，2008。

伊琳娜·帕佩爾諾，〈藝術的意義：象徵主義理論〉，林精華主編，《西方視野中的白銀時代》，北京，2001。

海野弘著，黃靜儀譯，《秘密結社的世界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

Pupul Jayakar 著，胡因夢譯，《克里希那穆提傳》，台北：方智出版，1994。

《希臘羅馬神話辭典》，中和：谷風出版社，1986。

## 網路資源

維基百科：<http://de.wikipedia.org/wiki/Rosenkreuzer>